

足迹

—记著名考古学家吕遵谔教授

文生 何嘉宁

1949年。

吕遵谔老人

中选拔5名学者组成(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

各种问题，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深化书本知识。同一现象，第一次他会详细讲解，第二次也会给予解释，第三次则要求自己思考。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扎实功底，使自己在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受益匪浅。

实验考古 捡求真知

不难的问题，办起来却相当费力。这是因为考古专业设置在文科，文科教学配置实验室设备，在北大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后经多方努力，国家教委特批才购买了第一台显微镜和有关仪器。

1978年，吕遵谔先生招收硕士研究生，经与裴文中教授商议，他为研究生

动物拉回制作标本。在制作过程中，他和学生一起，不怕脏、不怕累，即使在夏天，动物的腐肉臭味熏天，他们也没有中止手中的实验。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旧石器考古教研室的标本已初具规模，有些标本为国内所罕见。

骨器问题初步解决后，吕先后即着



生先后在兰州大学、武汉大学、湘潭大学为考古专业开设旧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史、考古摄影等课程。

即使这样,由于我国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常的培养渠道仍不能满足各地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为此,吕先生在教学之余还常去各地办速成班。1974—1975年,为配合三峡工程,为沿长江各省举办了两期考古训练班,每期人数达20—30人。1999年3—4月,应洛阳文物局的邀请,70高龄的吕先生对洛阳市全体文物干部进行旧石器专业培训,在这些培训中实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办法,一边为学员讲授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一边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既开展了工作又培养了人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文化革命结束后,为了适应新时期考古学发展的需要,吕遵谔教授又担负起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考古专门人才的重任,为此他又在课程设置和科研计划上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经过十几年探索,目前北大成为国内唯一的旧石器考古硕士、博士培养基地,现已有20多位研究生毕业走向不同岗位,无论是在大专院校,还是科研第一线都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1998年2月为感谢吕先生的培育之恩,来自湖南、安徽、河南、山西、北京等地的20多位研究生举办了吕先生70华诞暨学术讨论会。其中关于湖南玉蟾岩、江陵鸡公山、陕西洛南盆地旧石器的报告都在近年先后跻身于中国考古学十大发现行列。

科学研究 重大发现

吕遵谔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科学研究,探索一种科研与教学

相互促进的模式。

1960年他赴内蒙古林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首次提出“红山文化”可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文化革命开始后,正常教学尚不能进行,科研工作更无从谈起。1972年刚恢复招生的历史系考古专业为配合三峡工程在湖北、四川进行考古调查,虽然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经常仅有土豆充饥,但在为期二年的洞穴调查中,调查洞穴100多个,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

发掘现场,后又向下发掘了半米左右,在清剥了几件骨化石后,熟悉人体每一块骨骼的吕遵谔教授,当即鉴定出其中一块为人的骸骨化石,并立即指示细心发掘,终于在揭开一大石块之后发现了金牛山人类化石,计有头骨一个(缺下颌骨),脊椎骨6个,肋骨2根,尺骨、桡骨、髌骨各1个,左右腕骨9个,左右侧掌骨各1个,指骨7件,跗骨11件,膝骨2件,趾骨13件,这些骨骼集中在1.6平方米的范围之内,无疑属于同

一个体。这次发现轰动了当时的科学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发现意义十分重大,获国家教委首次颁发的大学文科重奖。

两年之后,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1987年河北省徐水县文管所进修干部杨永贺在听了吕遵谔先生人体骨骼鉴定课后,记起《涞水报》曾报道过一个农民打地窖时发现“龙骨”的报道。闲聊中,吕先生建议他回去

作一些调查,并尽可能带一些标本回来。当这位干部几经周折找到这位农民时,说大部分骨化石已被一文物爱好者拿走,当杨永贺将剩下的几块带回送予吕先生后,吕先生眼睛一亮,当即判断,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人类化石,并根据叙述认为农民家里可能还有一部分未发掘出。后经发掘鉴定,除头部为农民敲碎不可复原外,其余部分几乎为一完整骨架,时代测定距今5万年。关于化石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根据髋骨和髌骨的研究,虽然涞水人化石只有5万年,但金牛山人身上所保留的原始性状却延续到涞水人身上。毫无疑问,涞水人的研究对了解东亚地区人类的进化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牛山人发现后,国内学者对金牛



在工地指导学生

石,其中有的十分罕见。

1975年,内蒙古大窑发现一批石器,邀请吕先生前去指导。经过详细的调研,确定了大窑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场。

1980年,赴四川资阳发掘。资阳人是解放后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晚期智人化石地点,但对其时代,学术界存有异议,这次发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1984年,为了解决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的实习问题,同辽宁省有关单位协商,在金牛山A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金牛山人类化石。这一地点在1974、1975和1978年曾由有关单位进行了几次发掘,已挖至距洞底10米深处。这次发掘,首先清理了以前留下的

山人的归宿及时提出了不少疑问。不盲从，坚持“1986年正式启动研究课题”，对金牛山人造、洞穴发气候、古环境综合研究，积于忧，器考古国199

的吕遵谔教授，征尘未洗，即被南博物馆邀去鉴定一古人类化石，这在人类学界一重大发现。1993年底，吕遵谔教授偕同李孝芳、李黎、孙明元等石的汤山葫芦洞进行考古发掘，受省文物局委托，吕先生担任队长，主持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又获1枚人类牙齿化石。南京人的发现对了解直立人的特征，了解南方地区人类演化历史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吕遵谔教授访问了法国自然博物馆、人类博物馆等，并准备对南京人化石进行进一步合作研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70高龄的吕先生仍雄心不减当年，在完成《南京人化石地点》专著后，又开始金牛山人的“综合研究”。我们相信，这些研究对人类学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学科前瞻 寄语后人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者已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人类起源和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但总的来看，我国考古学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就目前而言，我国考古学在以下几个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1. 在发掘技术上，许多遗址尚不能按科学方法进行发掘，以致许多珍贵资料因缺乏确切地层依据，在研究时失去意义。有的发掘者只顾寻找精品，将大量考古材料弃置不顾。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遗址的发掘水平达不到周口店山顶洞的水平。故提高田野发掘水平乃当务之急。另外，从研究方法上看，简单的形态分类仍占统治地位，研究者着眼点仍不能“由物见人”。